

JIN DAI E GUO LI XIAN YUN DONG' YUAN LIU

近代俄国 立宪运动源流

姚海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JIN DAI E GUO
LI XIAN YUN DONG
YUAN LIU

封面设计:唐利民

ISBN 7-5614-1291-6



ISBN7-5614-1291-6/K · 143

定价:8.00 元

9 787561 412916 >

近代俄国立宪运动的源流

姚 海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6年·成都

(川)新登字014号

责任编辑: 陈丽莉

封面设计: 唐利民

技术设计: 蒋 蓉

近代俄国立宪运动的源流

姚 海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市望江路29号)

成都教育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7.5 印张 185 千字

1996 年 4 月第 1 版 199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2200

ISBN7—5614—1291—6/K·143 定价: 8.00元

目 录

引言	(1)
一、自由主义的传播与立宪观念的萌芽	(16)
自由主义进入俄国	(16)
政治觉醒的开端	(18)
限制专制权力的尝试	(22)
解放思想的产生	(25)
开明专制的意义	(30)
二、贵族自由主义的发展与宪政方案的提出	(38)
政府自由主义的改革	(38)
法制国家之梦	(43)
公民社会的设想	(48)
融合于俄国传统	(51)
改造社会的冲动	(55)
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形成与立宪运动的开始	(61)
新时代的呼唤	(61)
大论战的孕育	(66)
登上政治舞台	(71)
四、自由主义反对派与迈向宪制第一步	(76)
解放农民	(76)
要求立宪	(82)
中间道路	(86)
引入资产阶级国家因素	(90)

五、地方自治机关与立宪运动的曲折·····	(96)
立宪运动的基地·····	(96)
洛里斯—麦利科夫方案·····	(99)
反对派的沉默·····	(103)
联合行动的努力·····	(106)
六、自由主义阵营的演变与立宪运动的发展·····	(110)
队伍的扩大·····	(110)
组织的建立·····	(114)
内部派别的形成·····	(119)
活动方式的变化·····	(124)
向沙皇政权挑战·····	(127)
激进倾向的加强·····	(130)
和平改革的希望破灭·····	(133)
七、第一次革命与立宪运动的高涨·····	(137)
立宪派推波助澜·····	(137)
关于人民代表机关性质的争论·····	(140)
“向人民呼吁”·····	(145)
从8月6日到10月17日·····	(150)
立宪派政党的成立·····	(154)
国家制度改革·····	(160)
议会斗争的展开·····	(164)
八、六三政体与立宪运动的反复·····	(171)
妥协倾向的回潮·····	(171)
自由主义的《路标》·····	(174)
官方改革的最后尝试·····	(178)
立宪运动重趋活跃·····	(183)
九、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立宪运动的成败·····	(188)
改变斗争策略·····	(188)

发展社会组织	(192)
成立进步同盟	(195)
参与共济会密谋	(198)
被迫接受革命	(202)
掌握国家政权	(207)
违背人民的愿望	(211)
走向失败的结局	(220)
后记.....	(228)
参考书目.....	(229)

引 言

近代俄国立宪运动是与自由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和发展紧密联系的一个过程。18 世纪初期以来,几代欧化的俄国贵族和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精神和理想的推崇和追求,构成了俄国立宪运动的历史。在俄国和欧美学术界,这一运动通常被称为自由主义运动。列宁对于以争取实行宪制为基本目标的俄国自由主义运动作过许多深入的论述,并认为它是与革命民主主义并列的近代俄国解放运动的两大流派之一。

自由主义本是产生于西欧北美的社会政治哲学。在世界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新兴的资产阶级展开了广泛的斗争,发生了英国、法国和美国的伟大革命。这个过程的精神成果,就是形成了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的理想目标是实现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其内容包括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从事经济活动和拥有私人财产的权利,实现普选权,建立代议制议会和向选民负责的政府等。早期自由主义的“天赋人权”思想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锐利精神武器和重要推动力量,成为资本主义新时代的信条。大革命时代过去之后,自由主义不再主张以革命方式争取人的自由权利,而希望通过社会改良来达到这个目标。19 世纪初,自由主义发展为遍及欧美的思潮和运动,并在一系列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得到不同程度的体现。作为正统的资产

阶级文化，自由主义被认为是西方文明的世俗形式发展的顶点。^①

俄国的自由主义来源于西欧。彼得一世的改革为西方文化进入俄国创造了条件。在西欧启蒙运动的强劲冲击下，自由主义思想进入了俄国的社会意识。俄国启蒙思想家对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的批判以及叶卡特琳娜二世实行的“开明专制”，标志着俄国贵族在价值取向上的分裂，孕育了俄国立宪思想的萌芽。

19世纪初期，俄罗斯帝国也被卷入了欧洲自由主义改革的浪潮之中。在俄国贵族中，自由主义风行一时，斯贝兰斯基、莫尔德维诺夫等贵族自由主义者明确提出了向宪制过渡的方案和设想。1812—1815年的战争之后，西方自由主义文化对俄国的冲击出现了高潮。自由主义思想日益与不断增长的资本主义因素相结合，实现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的要求成为十二月党人运动所体现的贵族革命性的主流。19世纪30—40年代，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著名论战促进了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形成。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作为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登上了俄国政治生活的舞台。它主张由沙皇政权的主动改革来解决俄国发展的道路问题，要求消灭农奴制度、保证公民权利、公开政府活动、逐渐向代议制过渡。它的活动对于1861年的农民改革和随后的一系列结构性改革起了推动作用，使俄国朝资产阶级立宪君主制的方向迈出了最初的一步。在19世纪70—80年代之交俄国出现革命形势的情况下，自由主义者认为，俄国社会的深刻变动呼唤着政治自由，沙皇专制制度必须向立宪制度转变才能给俄国以新的生命。他们掀起了一场颇有声势的立宪运动，力图促使沙皇政权向时代精神让步。但在革命浪潮消退之后，立宪运动也转向低落。受到沙皇政权压制的自由主义者默默无闻地专注于地方自治机关中的社

^① 参阅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811页。

会和经济事务，他们认为这些具体的工作最终将有助于实现把专制制度改造为立宪制度的目标。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俄国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自由主义的纲领和策略趋于激进化，立宪运动不断高涨。1903年，解放同盟、立宪派地方自治人士同盟等非法的自由主义政治组织相继成立。他们明确地提出了在普遍、直接、平等和秘密的选举的基础上实行宪制的要求，并以多种方式展开了广泛的反政府活动。在第一次俄国革命中，自由主义与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结成联盟，迫使沙皇专制政权走上了立宪改革的道路。但它满足于10月17日宣言许诺的改革，希望在国家杜马中进行合法的议会斗争以实现真正的宪制。

第一次革命的失败使自由主义立宪派政党转向同沙皇政权妥协，并在一定程度上与之结盟。但由于1911年以来俄国工业的高速发展，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的矛盾又趋激化，立宪运动重新兴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立宪派政党不断加强的反对派活动在加剧沙皇政权的危机、推动俄国政治进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17年的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制度，立宪派政党掌握了国家政权。然而，在此之后短短几个月中，他们就从成功的顶峰跌落下来。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十月武装起义的胜利，标志着俄国自由主义的终结。

二

以争取俄国国家制度从沙皇专制向立宪君主制转变为主要目标的俄国自由主义，有着迥异于西方自由主义的命运。西方的自由主义以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成熟为前提，植根于肥沃的土壤之上，而俄国的自由主义则没有如此广泛和深厚的基础；西方的自由主义作为新生产力的政治思想代表取得了对于封建主

义的胜利，而俄国的自由主义在试图超越宗法制传统时却不得不经常与这种传统妥协；西方的自由主义逐渐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政治原则，而俄国的自由主义却始终处于非主流状态；西方的自由主义代表了方兴未艾的资产阶级文化，而俄国的自由主义在其主要对立面沙皇专制主义垮台之后很快失去了立足之地。

从根本上说，自由主义在俄国的形成和发展与西方的同一过程是在极为不同的条件下进行的。俄国自由主义的命运实际上就是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

在世界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中，由于各国建立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前提条件的成熟程度不一，因而呈现出一种梯队形的进程。如果把英国、法国、美国作为第一梯队，那么俄国和德国、日本等则属于第二梯队。在西欧和北美，资本主义是从前资本主义社会里有机地生长起来的。而在俄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基本上不是成熟的社会演变结果，相反，带有明显地从外部引进的特点。与第一梯队的国家相比，俄国的资本主义具有次生性、继发性。俄国是在西方资本主义胜利所产生的强大冲击力的作用下被推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政权在这个过程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直到1917年，就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而言，俄国与西方之间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俄国资本主义的落后和俄国资产阶级对沙皇政权的依赖，必然地延伸为俄国自由主义的软弱。

与资本主义的落后并存的是传统的强大。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俄国曾在精神和观念方面受到拜占庭的影响，而蒙古征服者则在其社会生活 and 政治结构方面留下了深刻印记。几个世纪的争取独立的斗争促进了专制制度的建立，同时也导致了关于个人应绝对服从国家和忠于君主、臣民的首要义务是保卫疆土和维护东正教信仰的社会意识的形成。在农奴化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土地重分型公社成为专制国家的基础。村社实际上是家庭和家族的自然延伸，而在无数个相互隔绝的村社之上，便是他们的共同保护者、权

力无限的沙皇。宗法制原则是维系俄罗斯民族的纽带，而村社则是其中的关键环节。

在这种环境下形成的俄罗斯民族精神集中体现为皇权主义和村社集体主义。俄国农民迷信沙皇，把全部苦难都归于地主，而把全部希望都寄托于沙皇。沙皇被认为是全俄罗斯的父亲、人民的保护者，而任何试图反对沙皇的人都被视为人民的敌人。即使在农民揭竿而起为土地和自由而斗争的时候，他们也要打出拥护好沙皇的旗号。如果说对沙皇的信仰在第一次革命后逐渐淡化的话，那么村社集体主义就显得更加根深蒂固。以公有和平均为原则的份地村社所有和定期重分是村社集体主义的支柱。村社一方面把农民束缚于封闭、狭隘的天地，另一方面又使农民避免分化、维持自然经济。在村社这个宗法共同体中，个人是微不足道的，只有集体才有意义。村社吞没了个人，集体主义又排斥了自我意识。很明显，这种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以剥夺个人自由为前提的宗法文化，同与商品经济相适应、以人的自由发展为核心的自由主义文化是格格不入的。

从彼得一世时代以来，进入俄国的西方新文化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具有鲜明的贵族特征，就是19世纪中叶形成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其代表也多为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具有贵族身份的知识分子，因为当时掌握社会精神生产手段的主要是贵族。而俄国贵族的欧化是以俄国农民地位的进一步恶化为代价的，这一事实更加强了农民对一切来自西方的新思想和新事物的敌视。直到第一次革命前，农民仍普遍认为普选权和代议制不如沙皇制度好，只有高于一切人之上的沙皇才是对一切都公道的。农民的村社传统也使他们对于以私有制和竞争原则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持排斥和抵制的态度。正因如此，沙皇政权直到1905年仍把俄国农民视为“保守主义的支柱”和“国家制度的命根子”。而根源于西方的俄国自由主义在很长时间里却是和作为俄罗斯民族主体的农民互相脱离

的。

从本质上说,俄国自由主义是一种反传统的力量,它要求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的理想是同专制主义严重对立的。但在俄国条件下,它无力独自实现自己的目标。如果不同强大的传统实现某种妥协,它就无法生存和发展。俄国自由主义把沙皇政权视为建立新秩序的工具和手段,宣扬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和解和妥协,希望通过合法的反对派活动来促使沙皇专制制度自我限制、主动改革,并且在事实上一再地同专制主义妥协乃至结盟。在19世纪后半期,带有浓厚俄罗斯色彩的温和倾向一直是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主流。直到世纪之交,其激进倾向才开始有所发展。俄国在资本主义道路上走得越远,新旧两种文化的矛盾也就越尖锐。当自由主义的温和改革要求由于专制主义的不妥协而不能实现时,自由主义中的激进倾向就逐渐占了上风。

自由主义与革命民主主义的关系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它与传统文化的矛盾。自由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是俄国解放运动的两大流派,二者在改变现状的方式和俄国未来的方向问题上存在着重大分歧。列宁曾经指出,19世纪中期以来俄国政治解放运动的全部历史就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同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斗争的历史。^①这个斗争的中心问题便是如何克服俄国同欧洲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差距、实现社会的进步,亦即俄国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自由主义代表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主张学习西方,通过资本主义来发展文明。它认为,由于俄国资本主义的微弱和专制主义的强大,这个目标只能以温和演进的方式,由国家政权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来实现。而革命民主主义反映了俄国农民的愿望,主张以暴力革命来推翻旧制度,然后通过改善和巩固村社的途径使俄国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过渡到社会主义。

^① 参阅《列宁全集》第17卷,第540页。

在革命者看来，自由主义意味着对沙皇政权过分的忍耐和迁就、有害的姑息和纵容。从车尔尼雪夫斯基到革命民粹派和社会革命党，都表现出对现存制度的激烈否定态度。但在这种革命性下面，潜藏着植根于宗法制传统的“村社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流派和社会运动，革命民主主义虽然也受到西方空想社会主义和革命思想的影响，但它基本上仍是俄罗斯生活和俄罗斯精神的产物。在自由主义者眼中，革命民主主义试图鼓动群众以暴力改造世界的目标不仅是幻想，而且是危险的。自由主义把沙皇政权视为进行社会变革的主要手段，认为冒失的举动将会断送俄国尽快实现改造的可能性。为了使专制制度向立宪制度转变，自由主义在策略上倾向于同沙皇政权妥协与合作。与此同时，它虽然在原则上反对革命，但并不排除借助革命运动之力。

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从形成之时起就一直在专制主义与革命民主主义的夹缝中求生存、争发展，往往根据革命运动的消长和沙皇政权政策的变动来选择自己的立场，走一条介于保守与革命之间的中间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的自由主义文化不仅影响了俄国社会，同时也冲击着专制政权。于是就出现了自由主义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政府自由主义。这是沙皇政权同自由主义妥协、向时代精神让步的产物。在近代俄国向立宪制度缓慢过渡的过程中，政府自由主义曾起过重要作用。为了保持俄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大国地位，沙皇政权通常也实行有利于工业增长的政策。而新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导致专制制度基础的动摇，因此在政治方面就产生了以小的让步避免大的动荡的策略方针，即由政府实行具有自由主义性质的改革以缓和社会矛盾。继叶卡特琳娜二世的开明专制开俄国政府自由主义风气之后，亚历山大一世的改革、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斯托雷平改革等等，都是政府自由主义的代表之作。政府自由主义不是始终一贯的，它一般出现于西方文化的冲击特别强大和专制制

度面临严重危机的时候。在俄国近代史上,改革与反动总是交替出现,这种规律性的现象反映了俄国社会中深刻的文化冲突以及政治力量的某种均势。无疑,由沙皇政权实行的改革有很多局限性,但它终究对于引入和巩固新的文化因素、使俄国朝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例如,马克思在评论沙皇政权的农民改革方案时说,它“已经达到了‘人权宣言’”,并将产生重大的影响。^① 列宁在论及斯托雷平土地改革时指出,改革“浸透着纯资产阶级的精神”,“最无情地推毁了旧制度”。^②

三

1917年的二月革命在总体上超越了俄国自由主义运动所追求的立宪目标。几个月后,自由主义退出了俄国历史舞台。这一结局表明,通过渐进的和平方式以资本主义精神改造俄国的道路没有走通。然而,对于导致俄国自由主义失败的原因,仍有必要作深入的探讨。

有一种十分流行的观点认为,1917年俄国发生的变化具有必然性,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失败命运是注定的。这个结论同列宁的看法是相左的。在二月革命四个月之后,列宁曾经就俄国的未来发展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还不知道俄国革命明天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是回复到君主制,是加强资产阶级,还是使政权转入一个更先进的阶级手中。这是谁都不知道的。”^③ 在这里,列宁所表达的显然不是必然性,而是多种前景的可能性。俄国资本主义的落后固然造就了俄国资产阶级的软弱,但沙皇制度的被推翻使俄国处

①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19页。

② 参阅《列宁全集》第13卷,第223、435页。

③ 《列宁全集》第24卷,第528页。

在历史的十字路口,面临选择发展道路的机会。俄国自由主义希望建立以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为基础的政治制度、使俄国进一步欧化的目标,也是可能的选择之一。

由于意识到先天不足的缺陷,几乎所有俄国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都承认,只靠自己的力量不可能实现自由主义的理想目标。自由主义的精神领袖鲍·尼·齐切林在19世纪60年代初曾经说过,在俄国只有两种力量是强大的,这就是沙皇和人民。这种情况虽然随着俄国在资本主义道路上的发展而逐渐发生变动,但直到20世纪初仍无根本转折。由于这个原因,俄国自由主义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可能获得成功:或是由沙皇政权主动实行自由主义改革,或是自由主义吸引人民并得到他们的支持。进入20世纪后,出现第一种情况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在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之时,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倒行逆施,破坏了俄国社会和平发展的可能性。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政权,自由主义政党由于得到民主派政党的支持而掌握了国家政权。但俄国的前途仍取决于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而这一斗争的关键就在于谁能够吸引人民跟自己走。在1917年,人民是俄国生活舞台上真正的主角,对和平和土地的渴望推动着事态的发展。由于各种原因,自由主义政党没有把握人民的脉搏,继续进行战争并延缓民主改造任务的解决,从而不能维持在二月革命中形成的资产阶级与广大小资产阶级的政治联盟。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则紧紧抓住了和平和土地的口号,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在布尔什维主义与传统的农民民主主义结合之后,自由主义的末日也就到了。

俄国自由主义是在近代俄国欧化进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思想运动,具有那个历史时代所造成的缺陷和弱点,也不可避免地具有阶级的局限性。但是,作为反对宗法制传统和推动俄国向现代国家演变的重要力量,作为对俄国发展道路的一种探索,它也留下了一些有价值的遗产。

四

在俄国,对自由主义运动史的研究始于第一次革命期间。在那时出版的有关这一问题的专著中,较为重要的有Н·И·伊奥尔丹斯基的《地方自治中的自由主义》(莫斯科,1905年),В·С·戈卢巴耶夫的《地方自治机关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顿河罗斯托夫,1905年),С·Г·斯瓦季科夫的《俄国社会运动·1700—1899》(顿河罗斯托夫,1905年),В·Б·韦谢洛夫斯基的《地方自治机关中的自由主义者》(圣彼得堡,1906年)和К·Н·阿恰多夫的《国家政权与地方自治》(莫斯科,1907年)等。这些著作论述了19世纪末期以来知识分子数量的增加和反对派情绪的增长、自由主义者在地方自治机关中的活动、地方自治机关与沙皇政权的关系,以及地方自治机关作为代议制萌芽和政治制度民主化的基础的意义。但研究者们尚未将自由主义思想和运动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也未能明确区分地方自治和自由主义这两个概念。

在两次革命之间的十年中,地方自治中的自由主义继续在一些论著中得到反映。韦谢洛夫斯基所著的4卷本《地方自治40年的历史》在1909—1911年间相继出版,这是当时有关这一课题的最详尽、最深入的研究成果。И·П·别洛贡斯基是另一位主要研究者。他是任职于地方自治机关的统计人员,曾因参加民粹派运动而被流放西伯利亚。1907年,他在《往事》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论文:《人民自由党成立之前的地方自治运动》。此后,又陆续写出了《地方自治运动》、《地方自治与立宪》两部专著和一些文章。在较为系统地研究了地方自治的演变和立宪运动的发展之后,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自由主义对议会制度的追求为俄国摆脱政治危机提供了可能性。韦谢洛夫斯基和别洛贡斯基都强调知识分子在自由主义运动中的作用,并认为地方自治中的自由主义运动是俄